



总主编
龚书铎

中國文化 發展史

魏晉南北朝卷

韓昇 主編

山東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國文化 發展史

总主编
龚书铎

魏晋南北朝卷

韩昇 主编

山東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发展史. 魏晋南北朝卷/龚书铎主编; 韩昇
分册主编.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328-7932-8

I. ①中… II. ①龚… ②韩… III. ①文化史—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8013 号

总 策 划/陆 炎
责任编辑/白汉坤
装帧设计/石 径

中国文化发展史

魏晋南北朝卷

龚书铎 总主编

韩 昇 主 编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4 传真: (0531)82092625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27.75 印张

字 数: 4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7932-8

定 价: 69.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539-2925659

目 录

导 论 / 1

- 一、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界定 / 1
- 二、几多源头几多变 / 6
- 三、本时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总体评价 / 9

第一章 社会动荡与文化的多元发展 / 11

- 一、专制暴力拉开的沉重序幕 / 11
- 二、名教不振与君臣之义的歧变 / 16
- 三、独立人格的高扬与主体意识的觉醒 / 26
- 四、胡汉文化的对立与杂糅 / 46

第二章 不断调整中的地域文化 / 58

- 一、对两汉地域文化的突破与改塑 / 58
- 二、吴蜀文化的嬗变 / 64
- 三、五凉政权与河西文化 / 71
- 四、胡风吹拂下的中原文化 / 77

第三章 波涛汹涌的玄学思潮 / 97

- 一、破除烦琐经学的清新思想 / 99
- 二、清议、清谈、玄学 / 102
- 三、玄学讨论的主题 / 105
- 四、玄学的发展阶段 / 115

第四章 逐渐站稳的外来宗教——佛教 / 146

- 一、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与佛教 / 146
- 二、慧炬相传的译经事业 / 155
- 三、从般若学到涅槃佛性论 / 163
- 四、禅法的演变 / 178
- 五、戒律、仪轨和法会 / 184
- 六、偶像崇拜 / 194

第五章 道教的不断规范整齐 / 205

- 一、道教的流布与分化 / 206
- 二、南北朝道教的改造与成熟 / 216
- 三、魏晋南北朝道教和其他社会文化形式的关系 / 232

第六章 学术的创新与育人途径的多样化 / 253

- 一、南北学风的差异 / 253
- 二、史学之花灿烂芬芳 / 260
- 三、几经浮沉的官学 / 269
- 四、大放异彩的私学 / 277
- 五、宗教教育 / 281

第七章 社会风俗中的文化基因 / 288

- 一、衣食住行与文化 / 289

- 二、婚葬习俗的变化 / 302
- 三、节令与娱乐 / 316
- 四、宗教信仰与世俗迷信 / 323
- 五、铜雀高台与人间佛陀 / 332
- 六、怡情山水的园林建筑 / 336

第八章 绚丽多彩的文学艺术 / 339

- 一、文人诗的变迁 / 340
- 二、神怪小说与札记文学 / 351
- 三、乐府与民歌 / 358
- 四、文学评论与文艺理论成就 / 369
- 五、绘画、书法和雕塑 / 377
- 六、汉乐胡舞 / 387

第九章 征服自然的文明硕果 / 395

- 一、发达的数学和天文学 / 395
- 二、农学和地学的成就 / 404
- 三、炼丹术与化学 / 412
- 四、机械与手工业技术 / 422
- 五、辉煌的医药学成果 / 426

主要参考书目 / 433

后 记 / 437

导 论

一、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界定

文化，是一个充满魅力，也带来迷惘和困惑的名词。

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并不是我国古典意义上文治教化的文化，而是西语 civilization 的翻译词汇。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文化系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在使用上，文化和文明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文明史。

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史，并不是本书撰写的目标。在这本不厚的小书里，我们只能探讨狭义的文化，介绍魏晋南北朝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主要包括思想、宗教、学术、教育、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变化与成就。

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上，魏晋南北朝史成就斐然。陈寅

恪、严耕望、唐长孺、王仲荦、周一良、韩国磐、田余庆等先生的杰出研究，使得这一片天空星光灿烂。这些研究彻底改变了以往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总体认识。

过去，魏晋南北朝史给人以黑暗和野蛮的印象。尤其是在华夷观念的影响下，旧学者片面强调胡族入据中原所带来的破坏，过度赞颂“大一统”，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描写得一团漆黑。这种史观，建立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有悖于客观地进行研究的原则，容易把历史变为作者宣泄感情的地方，而不能对历史的进程进行有意义的考察。陈寅恪、严耕望等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开展了多层面的研究，让我们看到该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中国历史进程所带来的深刻影响，犹如为我们打开了殿堂的大门。

诚然，从物质生产的发达水平、社会生活的富裕程度来看，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北方地区，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倒退，处于汉唐之间，该时代正是一个漫长的“U”型谷底时期。然而，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时代呢？

国家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然而，国家更是这种物质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精神文明的象征。国家的繁荣昌盛欣欣向荣，源于其高度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西汉的董仲舒为王朝建构了“天人感应”统治理论，把社会政治道德与家族伦理同自然现象相协调，用神学化的儒学让王朝的统治获得神圣的正统，从理论上，皇权代表着正义和公正。而汉朝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周边地区，这种地位加强了其唯我独尊的文化陶醉，从而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即使周边民族也不能不承认汉朝的优越。这时候，国家更具有文化的意义。饱受儒家思想浸熏的士大夫秉持“以夏变夷”的立场，而具有高度的文化使命感。

这种现象，在西方也曾经出现过。崛起于地中海的罗马帝国，代表着古代西方文明的辉煌。最让罗马人深自陶醉的不是勇士拱卫的皇宫，而是一句简单而响亮的话语：“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从罗马人口中一板一眼地说了出来，帝国的荣誉、罗马人的自豪和对周边民族的吸引力，尽在其中。多少沧海桑田的岁月流逝，这句话依然让后人萦怀，刻骨铭心。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中，感慨万千道：“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使罗马帝国的使命感成为合情合理。它不仅使罗马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使它的臣民愿意受到同化和被包括在帝国的框架之中。统治者认为文化优越感是

理所当然的，而被统治者也承认是这样。这样，文化优越感便加强了帝国的力量。”

这种文化的活力，在东汉时代逐渐枯竭。从政治方面看，官僚腐败、外戚宦官当政和边疆民族的反叛，内外交攻，把帝国的活力侵蚀殆尽。在东汉灭亡的诸多因素中，政治人事的腐败是最根本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的序幕，就是在东汉帝国的崩溃中拉开的。

一个王朝的灭亡，实是其制度文化衰竭的结果。从制度上说，主要是国家的公共职能逐渐萎缩，甚至基本失去作用，从而在社会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上，利归权门，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强梁横暴，贫弱受欺。从文化上说，则是思想的禁锢、学术的僵化和社会凝聚力的丧失。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起源始于官僚的私利对公权的侵蚀。

在长期和平的农业社会，生产的增长相当缓慢。维持现状，小富即安，官吏难有什么远大志向。相反，追求升官发财，封妻荫子，却是现实的诱惑。国家的文化创造力，在安逸与奢靡中一点点地丧失。自上而下，官员们醉心于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国家公共权力逐步演变为官僚餐桌上的蛋糕。没有权势的民众不但投诉无门，反而要遭到公权的进一步压榨。因此，社会基层自然形成自我保护的私人势力，他们多为乡村宗族大姓，而不堪官吏侵渔的农民，以及破产的贫民，不断地被置于大姓门下。国家公共权力与强宗大族垄断乡曲，中央统治与地方势力，此消彼长，东汉王朝在离心离德中逐渐衰败。

面对严峻的局面，强烈主张大一统的儒家士人痛心疾首，奋然而起，针砭时弊，要求整顿吏治，扶大厦于将倾。出乎这些理想主义斗士意料之外的，竟是他们视为神圣的皇帝并不支持他们，反而将他们贬黜流放，禁锢乡里。两次的“党锢”，使他们不能不痛心地面对公正之神坠失的严酷事实，理想的世界在眼前轰然倒塌，在精神炼狱中煎熬，失落迷茫，不知乡关何处。

从官吏腐败到舆论钳制，国家政权在恶性循环中丧失的是表现为凝聚力的文化精神，这是我们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和探讨的文化层面。

事实上，东汉王朝并不是亡于黄巾军。利用社会精神崩溃，挟鬼神法术聚众而起的黄巾军，最多只能提出正义与公平的诉求，而不具有创建国家的文化力量。可怕的现实是，被朝廷解除禁令而重新活跃于政坛的儒士，借助地方势

力，迅速扑灭黄巾军之后，已经不打算重建腐朽的东汉王朝了。当然，对于未来国家的蓝图，他们也是一片惘然。这种迷惘，带来了群雄并起、军阀割据的局面，东汉王朝早已是名存实亡，等待它的只是谁来决定“禅让”的时间。

曹操、刘备和孙权，都起于基层，在镇压黄巾军中壮大。他们都想革除东汉弊政，借助地方力量重建国家。然而，他们都没有成功。摘得胜利果实的司马懿祭出儒家的忠孝旗帜，企图用过时的政治伦理来收拾残局，当然只能事与愿违，文化上毫无建树，政治上得过且过，官场更加腐败，风气日益颓靡。其以权诈夺取天下的做法，为子孙所继承，毫无道义的“八王之乱”，把儒家忠孝伦理也彻底践踏了。没有活力的虚伪政治，同样在文化上采取高压政策，士人遭到迫害，知识分子的心灵再一次受到凌辱和鞭笞。西晋的灭亡证明，不能树立具有号召力的文化精神，就无法建构新的国家。

国家沉沦，士人激愤，他们以逆反的形象出现于历史舞台，用乖张的行为，向黑暗的政治进行激烈的批判。对政治的绝望，激起对儒学的鄙弃，他们热心于《老子》、《庄子》和《周易》“三玄”，主张“贵无”，用“无”作为有力的批判武器，高谈阔论，冷嘲热讽，《无君论》、《钱神论》、《物理论》、《神灭论》、《声无哀乐论》……一篇篇闪烁着思想光芒的文章，把儒家精心构造的君权统治理论冲击得土崩瓦解。早期的“玄学”，是政治高压下非正常生长的思想解放与革新运动。

在世界观方面，玄学士人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挣脱儒教的束缚，追求真实自然的人生。他们身着宽袍大衣，服食药饵，欲求成仙。

经历国家崩溃、社会动荡的乱世，士人对现实政治的批判，逐步转向重新建构新的文化内核上来。各种思想的交锋与碰撞，各民族的斗争与融合，对批判的再批判，开始形成更具有理性与包容的文化精神。从“贵无”到“崇有”，乃至三教合一，从文化整合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新时代的文化精神逐渐显现出来，隋唐文明的盛大景象，其多元文化的兼包并蓄和高度开放的特征，都是魏晋南北朝各种文化交融的结晶。这一文化重建的过程，无疑是我们必须予以重视的课题。

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动力，源于国家和文化重建过程中对各种途径的大胆探索。旧的意识形态被打翻在地，文化统治权威失坠，各种思想冲破牢笼，

勃然生长。不仅是儒家学说经历了被怀疑摒弃到重新建构的更生，其他各种思想都在理性批判的审视下被读解、扬弃和吸收。兵荒马乱之世，对人生与世界的现在和未来的思索，显然具有特殊的感受，更容易激起对宗教的向往。

玄风炽盛，助长道教流行。登仙的渴望，寄托着人们脱离乱世，追求太平世界的梦想。道教组织能给人以现实的帮助，其登仙的目标，正可弥补儒家对鬼神敬而远之的不足。然而，道教所追求的未来，只是现世升华性的延长，还不足以构成宗教意义的来世。印度传来的佛教，便以其严整的宗教理论迅速普及。佛教世界观与中国人的认识差距颇大，但它遇到难得的机遇，玄学主张“贵无”，佛家借此谈“空”，一时之间，“格义”佛教附托着玄学道教迅速传开。在北方，胡族统治者力图用外来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因此积极奖掖佛教。佛教“轮回”的教说，向世人展现出前所未闻的未来世界。先是用道家的观念去“格”佛教之“义”，到积极翻译佛教，直接读取佛教思想，物换星移，佛教广为流行，反超出道教之上。尽管曾经出现过借助政治权力排除佛教的事件，但此时佛教早已深入人心，难以动摇。这时期，宗教已经成为构成新文化的基本要素，想要脱离道、佛两家来把握南北朝乃至隋唐文化，已是不可能的。因此，宗教的成长，是该时代文化史的重要方面。

魏晋南北朝勇于探索的精神，难能可贵。它促使各个领域生机盎然，出现前所未有的进展。崇尚自然，对世界的探索，促进了数学、天文、地理等学科的进步。服食药饵与炼丹求仙，刺激医药与化学的发达。战争的需要和各种新作物的栽培，造成机械、手工业和农学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科学进步还比不上是最快的。但是，它确实是在思想解放的思潮中蓬勃生长起来的，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种意义还在于该时代无论是旧文化的批判者还是新文化的建设者个性的高昂与自觉。汉代的统治思想体系，强调个人对整体的归依。国家的公正神话破灭之后，激起的是个性的自觉，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视，尊重个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和崇尚自然。在此基础上探索社会的整合与重构，突出的是人文的关怀。

然而，人格重塑方面，魏晋士人陷入尴尬的困境。早期的“竹林七贤”以偏激的逆反形象出现，固然产生强烈的批判的震撼力，却没能建构新的人格标

准。在他们心中，人格的完善仍是儒家的身心修齐，他们所要摈弃的是压抑人性、阻碍个人发展的虚伪说教。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从骨子里说，他们仍未跳出儒家的框框。在思想战线冲锋陷阵的嵇康，临刑前遗命其后人要循规蹈矩做人，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所以，尽管他们发出阵阵启蒙式的呐喊，然而，却对社会道德伦理的重建提不出多少具有实质意义的东西。这就为将来向儒家价值体系回归种下近似宿命之因。

从后来发展的结果，后人可以看出其悲剧之所在，但是，他们不屈不挠的批判精神，是必须予以高度评价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经久不衰，其最深刻的内在活力，在于思想观念的解放，勇于对人生、社会和自然的无限的可能性进行不懈的探索。魏晋南北朝文化能够在乱世中大放异彩，其魅力正在于此。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社会从崩溃走向重建的时期，是古代文化更生的时代。从传统价值体系土崩瓦解的失落与迷惘中站立起来，在批判的喧哗中摸索未来，吸收各种纷至沓来的文化养分，用理性的审视建构未来的社会，是该时期文化史所必须予以最大关怀的主线。在这种精神引领之下，教育、科技、文学等领域都出现创新与突破性的发展，史学从经学的笼罩下独立，建筑向着追求个性与自然的方面突破等等，这些新的趋向与成果，我们都将予以介绍。

二、几多源头几多变

错综复杂、流动多变，是该时期文化的基本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分裂，是空前绝后的。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汉帝国崩溃，新的社会及其文化正在摸索创建之际，发生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入据中原的情况，打断了重构社会的进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与冲突，当然也带来了形态各异的多民族文化因素。

五胡十六国时代，最为突出的是民族矛盾与斗争。胡族以少数统治多数，同时也为了树立其统治的正当性，就必须利用民族矛盾，挑动民族仇恨，大力扶持和推广胡族文化。如前所述，佛教在北方的兴盛，与胡族统治者的大力提

倡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胡族统治的区域，汉人饱受欺凌，汉文化也遭到压制。胡语成为官方语言，胡人的生活方式大为流行。数百年间的胡族统治，对中原社会产生的影响极其深刻而广泛。对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无不表明，该时期胡化的程度相当高。胡饼、胡床、胡几、胡琴……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找到胡族习俗的影响。

而且，统治中原的胡族远不止一支，所谓的“五胡”，就有匈奴、羯、羌、氏和鲜卑，这还是其大者，此外的少数民族还有许多。因此，所谓的胡化，涵盖面很广，因素很多，不能一概而论。

还需引起注意的，是这些胡族基本上属于游牧民族，他们不仅带来自身的生活习俗，更由于游牧民族活动区域的广阔，以及从事商贸活动而来往于东西之间，所以还传入了许多来自西方的文明。

以往的学者颇以为胡族文化粗犷，尚不能与汉族文化比肩。这种见解，并不全面。在某些领域，胡族的文化水准，令人刮目相看。以后来的隋朝为例，在中央六部尚书中，胡人所占比例最高者，并不是兵部，而是工部，高达57%。^①实际上，从这时期乃至隋唐时代，著名的工程设计者，多为胡族出身。这说明，在建筑工程方面，胡人具有很高的水平。我们还可以再看看音乐舞蹈方面的事例。隋开皇二年（582），颜之推上书道：

“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高祖不从。

可知胡乐影响巨深。后来，隋朝定乐时，倚重郑译。郑译上言：

“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祇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译因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译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饮为均，推演其声，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

^① 参阅韩昇：《隋文帝传》，第262～2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胡族出身的尚书，在兵部和民部中均占43%弱，在禁军卫府大将军中占46%，都没有工部所占比例高。

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和合。^①

这段记载让我们深切感受到西域音乐对当时乃至后世影响之大。外来乐器中，一为羯鼓，一为琵琶，十分流行，极大地改变了传统音乐的面貌。隋朝重新定乐时，郑译所依据的乐器就是琵琶。而七声、八十四调及转调，明显都受到外来乐理的影响。至于隋朝的伎乐，《隋书》卷十五《音乐下》记载：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

外来的乐伎占绝对多数。这种情况，即使在中国统一之后也没有改变，隋炀帝重新确定的九部乐为：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唐朝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魏晋南北朝时代，大量外来文化的涌入，是文化发展中最为显著的特点。

随着胡族统治逐渐稳固，民族压迫的政策逐渐被民族融合的趋势所改变，于是出现了文化融合的现象，典型的情况是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需要强调的是“汉化”并不是“用夏变夷”的文化大转换，而是以“汉化”之名进行的文化整合，固然整合的基调是采行文明程度较高的汉制，但在许多方面吸收了胡族文化的养分。

这时也出现了区域文化的发生与融合。西晋王朝的灭亡，造成中原人口的大迁徙。流民的去向大致有三：第一是大规模向南方移动，数量以百万计。第二是向东北地区转移，大量的士人托庇于鲜卑慕容氏，帮助燕国强盛起来。第三是向西北地区迁徙，特别是在凉州一带建立起汉人政权，造就西北地区文化的发达。

国家分裂，士人辗转各地，造成中央文化失落而地方文化兴起的局面。流传于各地的文化，又与当地风俗相结合，而具有各个地区的特色。在南方，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相结合，洛阳音韵流行于建康地区，终于孕育出“永明文学”的奇葩，出现齐、梁文化的盛况。在西北地区，魏晋制度得到保存，大放异彩于乱世，以至后来南朝和北朝无不通过凉州地区迎回典籍旧制，使得传统

^①《隋书》卷十四，《音乐中》，第345～346页。

的礼乐文明得以赓续。

陈寅恪先生在其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指出，北魏汉化改革，得益于南朝萧梁新制的传入。而隋唐统一之后，其文化制度之源，一为北齐，一为南朝。且不论其论述是否完全成立，但他指出了隋唐文化是建立在各个区域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十分重要。这些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成为未来重新统一的源泉。

此时期士人由中央向地方流散，以及社会基层强宗大族的崛起，造成学术中心由官学向私学的转变，打破官方用行政权力筛选和评定学术的局面，各家学说并存，各种学科摆脱经学的笼罩而独立生长。学术成为天下望姓赖以存续的根基。士族不同于武断乡曲的豪强，就在于其文化的门风。各支士族坚守私学家法，代代相传，终使传统文化在兵荒马乱中顽强地保存下来，不绝如缕。

私家学术，比起粉饰太平的官学，具有更加强烈的现实关怀。这时期，私家撰史的盛况，前所未见，不仅获得史学从经学下独立出来的成果，更表明当时文化主流重视研究现实问题的趋势。在此学术潮流中，地理学、方志学、谱学、民族学、目录学、宗教著述与翻译……各种学科不断衍生出来，蓬勃发展，成就斐然。这些学科极大地丰富了学术园地，蔚为大观。思想的解放必然带来个性的解放和学术的自由，带来文化更新、充满活力的结果。

民族文化、外来文化、区域文化和私家学术，形态不同，异彩纷呈。魏晋南北朝时代，各种文化并存，相互竞争、渗透乃至融合，汇聚成隋唐文明的壮阔波澜。

三、本时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总体评价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激烈变化的时代，数十个国家政权，骤兴旋亡。南北各种民族，接踵而至。社会矛盾、民族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这样一个翻天覆地、无以复加的动乱，使得中国社会发生最为深刻的变化。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时代。

种种变乱的发生，是由于政治中心崩溃而引起的。我们不能离题去探讨汉晋帝国崩溃的原因，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晋帝国的崩溃与其统治意识形

态倾覆同时发生，造成政治真空与信仰阙失，影响之深远广阔，可想而知。

因此，该时期的文化，是在没有官方文化权威，缺乏严格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威权的意识形态价值评判，便难于进行严格的思想钳制，给了思想自由发展的天地。

这并不是说该时期没有发生对士人的迫害，然而，在所发生的事件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思想文化的钳制，而是政治权力的迫害。

不用一种简单的框框去限制文化发展的空间，必然会形成文化的繁荣。唐朝文明的繁盛烂漫，就在于没有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标准。

与此相应的，是士人在批判儒家经学中激起的自我觉醒，个性张扬与人格重塑，自觉地探索人生观、世界观等具有本质意义的精神世界，这一点，前面已有介绍。

因此，我们把这个时代视为思想解放、士人自觉与文化更新的时代。

边疆民族相继崛起与各种文化涌入同步，形成文化的多元发展。该时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在于其开放性。广泛接受各种外来文化，使得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精神风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文化与民族的融合，彻底改变了华夷区别的标准，胡汉之分不依据血统种族，而基于文化的高下。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并不多见，它是使中华民族日益壮大兴盛不衰的一大要因。

文化的开放，促进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了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宽广胸怀。这种包容，犹如巨大的海绵，吸收四面八方的养分，哺育出似锦繁花。文化创新及其持久活力的渊源，就在于此。

当然，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变动转型的时代，是一个披荆斩棘的耕耘期，而不是丰收的季节。政治动荡、社会分裂给其发展以多方面的制约，故其所达到的文化高度，远远不能和隋唐相提并论。但是，隋唐文化发达的基本条件，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形成的。

因此，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变秦汉而启隋唐的文化转型时代，历经挫折，却充满希望。

第一章

社会动荡与文化的多元发展

一、专制暴力拉开的沉重序幕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的序幕，是在东汉帝国的崩溃中拉开的。

一个王朝的灭亡，实是其制度文化衰竭的结果。从制度上说，主要是国家的公共职能逐渐萎缩，甚至基本失去作用，从而在社会资料配置和利益分配上，利归权门，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强梁横暴，贫弱受欺。从文化上说，则是思想的禁锢、学术的僵化和社会凝聚力的丧失。

东汉后期发生的“党锢”事件，是东汉社会矛盾的大爆发，使得金玉其表的东汉王朝业已彻底腐败的原形毕露，权威扫地，人心丧尽，可以说，“党锢之祸”是旧时代结束的